

和材料上有跨界

用天文学方法推算“孔子诞辰”

记者:大家对天文学史可能不太了解,天文学史的研究方式与人文史学研究有什么不同?

江晓原:天文史属于科学史的一种,所有科学技术的分类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科学史研究领域。大体上来说,自然科学领域里比较大的门类,比方数、理、化、天、地、生,它们在科学史里也比较大。还有比较冷僻的,比如研究纺织、造纸、冶金的,也是专门的学问,这些学问在科学史里比较小,研究的人比较少,科学史界把这些小的学问统统归类到技术史里。一般来说,天文学史、物理学史、数学史,这几个学科研究的人比较多。化学史、生物地质史的研究者就比较少了。

天文学史一直是科学史里最强的学科,位置现在还没有动摇。从大部分研究形态来看,科学史与历史学更接近,但它处理的部分不是一般历史学家能够处理的,它会围绕科学技术处理,要求研究者有科学知识的基本训练。我念研究生时,有条不成文的规定,科学史研究生招生必须是理工科学生。情况后来有所改变,上世纪90年代后,国际上外史的潮流开始盛行,这潮流要关注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,出现了很多学文科的人进入科学史领域。顺应这个潮流,我1999年到上海交通大学创建科学史系时,招生不限文理。这十几年来看,通过努力,(文理的)界限是可以打破的。

记者:天文学史主要研究什么课题?

江晓原:对古代历史研究是比较大的一支,中国古代流传下来100多部历法,表明我们历法有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,本身很值得研究。对历史上天文仪器的研究也是比较常见的课题。古人留下来的天文仪器,从全世界的角度看,数量是不多的。但每个仪器背后往往有丰富的文化含量。现在留下来的仪器被很多人拿来研究。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分支,古代留下来各种各样的气象记录,对它门进行整理挖掘,从里面可帮助解决现在天文学、历史学等问题。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成绩在国际范围是比较突出。

记者:你的关注点又在哪里呢?

江晓原:实际上我喜欢文科,但念了理科就不能白念。像我做的“天狼星颜色问题”是利用古代资料解决现代理论问题,它是我唯一为天体物理学这个专业贡献的一篇文章,第二年在西方有英文全译本出现,评价挺高。而“武王伐纣”和“孔子诞辰”,都是利用古代气象记录推算事件发生的年代。

譬如“孔子诞辰”,孔子到底哪年诞生?古代文献记载都不一致,说明这问题没有定论。很多现代人推算孔子生在哪一年,首先要知道孔子诞生的时代,他所在的鲁国是用什么历法。但历史文献没有留下这类记载,也不知道鲁国当时使用的历法的详细参数。我完全绕过鲁国历法的障碍,因为我在天文台工作过15年,对天文界比较熟悉,孔子诞生前50天发生过一次日食,我只要知道日食发生的时间,就可以知道孔子的诞辰。推算日食的时间不需要依赖古代历法,运用现代天体力学的方法就可以推算。到了今天,公元前3000年,共6000年间的所有日食、月食、八大行星在任何时候的位置,天体力学都可以非常精确地算出来,很简单。

有一天,我完全偶然地在报纸上看到有人讨论孔子诞辰的问题,我给助手(现在他也是我们学院的教授、博导了)打了个电话,让他算算那次日食在哪天,半小时后就算出来了,孔子诞辰也就出来了。不需要讨论春秋用什么历法之类的问题,可以把一个问题大大简化。以往文科学者推算孔子的诞辰时,不知道天文界有这样解决问题的思路,天文学家也不会关心孔子哪天出生,只有我们这种经常跨界搞研究的人才会留意。

记者:像现在流行的流星雨是用天体力学来推算?

江晓原:对。比方说预告哪天有金星凌日、哪天有日食、月食,都是用天体力学推算的。天体力学是天文学系学生必修的课程。

记者:在天文学史界,如何评价一个人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?

江晓原:一个学者步入学术界时,他刚开始

肯定是沿着博士论文往前延伸,很多学者的成名作是其博士论文,在这点上我又比较例外,我的成名作不是我的博士论文。实际我的博士论文至今还没出版过,在我已经出版了70多本书的情况下,它还没出版。博士答辩的时候,我在《天文学报》《自然科学史研究》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这些一级学报上,已经发表了10篇论文,我导师说你写一写这10篇论文的详细摘要,就可以答辩了,我的博士论文的篇幅只有4万字。我通过答辩,《中国科学报》还在头版做了报道,因为是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,那时候博士比较稀有。我博士毕业那年拿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资助,去开他们的年会。这是国际天文学界最高的学术会议。因为经常发表论文,我才能两次破格晋升副教授、教授。

把科幻纳入科学史研究的视野

记者:除了教授外,你如今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担任ISIS文库的主编,设“科学政治学”、“科幻研究”、“兵器文化”、“科学与时尚”四个开放系列。你是如何考虑的?

江晓原:这个文库主编倒不是挂名主编,我是真的做工作的,书是我选定的,作者、译者也是我组织的,今年出来了两种,还有四五种正在编辑中。

为什么设置这四个系列?这样的文库,主编的个人色彩很浓厚,简单地说是我对这四个方面很有兴趣,我也有考虑。首先,我没有打算把文库做成纯粹学院派不看的文库,我想做成一部分公众会有兴趣的文库。比如“科幻研究”,我们把科幻纳入科学史研究的视野,这是以前人家不做的,人家从来不认为科幻是科学史研究的对象。当我们把研究目光投向科幻作品(主要是西方科幻小说、科幻电影)的时候,会发现其实科幻与科学间的界限很模糊,甚至没有界限。我指导的一个博士就是做科幻与科学史研究的论文,这是国内这方向上的第一篇博士论文。

记者:你什么时候开始写科幻影评?它与你的研究工作有什么相关吗?

江晓原:2003年起有人约我写这方面的专栏,我在2004年开始写了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专栏,取名“幻影2004”,写了好几年。最初我并没有限定自己只写科幻电影的评论,但我想写点别人没有的东西,一般电影的影评很多人都能写,我不见得比他们高明多少。但我没看到让我满意的科幻电影评论,国内大部分写影评的人都是搞电影的人,他们没受过科学训练。在他们眼中,科幻电影与别的电影一样,完全不能理解电影背后与科学有关的思想,写得很表面。所以我后来写的影评,绝大多数都跟科幻有关。我博客左边有一栏目叫“亲近电影”,绝大部分都是科幻电影影评。只有个别的是其他电影,比如王家卫的《东邪西毒》这类的,应邀写的特稿。

性文化史研究,从玩票到专家

记者:你常常说,在天文台的工作是正业,性学研究是副业。你最初带着玩票的心态写性学论文,是什么促使你转入性学研究?一晃30年。

江晓原: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研究生,研究所院子里清一色的男生,年长的师兄们喜欢讲述自己“文革”落难时下层社会见闻的性风俗和性趣事,也讲自己的性经验,而经历简单的师弟们也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势参加讨论。性的寂寞与煎熬,通过这类讨论聊以排遣。我想把同学间性的漫谈推进到学术的层面,而作为“好古成癖”之人,方向自然也清晰明了——性的文化史。一开始玩票地写,性学界的人注意到了,找我加入性学界的队伍,后来甚至接受了性教育协会副会长的职务。不时做报告或评审、写序、写书评等,这样就在这圈子里存在了。媒体约稿、出版社约书,我都是被动的,有人来约,只要有空,我乐意,就会做,不知不觉就这样几十年了。

记者:这门研究需要怎样的知识背景?你会看哪方面的书?

江晓原:性学研究进门槛要求比天文学史低。我原本对中国古代各种文学作品、历史、典籍等都比较熟悉,我算是在同龄人中读过很多这类书的人。其实,与性史有关的大部分材料来自中国古代的典籍。比如武则天,传说她的生活相当放荡,但那时候朝廷对这事开放到

什么程度,不看史料是无法想象的,这史料在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这样的官史里就有。比如有位谏官有一次给武则天上奏,说你已经有两位情人,现在还有官员自荐阳具壮伟要当你的情人,这影响实在太坏了。依你推测,皇帝会不会勃然大怒?这太赤裸地涉及她的私生活了。但武则天只是轻描淡写地说:有这事吗?你不说朕还不知道呢。下令给谏官赏赐,之后该干吗还是干吗。朝廷上可以讨论这样的事情,太开放了。

对我来说研究性文化不算困难,抱着平常心,把它当学术来做,做法与做科学史是没差别的,性学史也是科学史的一部分。

记者:西方对性的研究从上世纪50、60年代开始,马斯特斯与他的助手算是鼻祖。你80年代开始这块研究时,国内还有哪些性学家?

江晓原:不会太多,在国内不太合适用性学家这个词,基本上没人自称是性学家。早先国内没开放时,不可能有人专门研究性。改革开放后,有一些人通过研究性在社会上享有知名度,潘绥铭、李银河,这两人算比较知名的人,性学圈子里也有些人。我们有个共同点,谁也不能靠性学研究为生,我们都有其他职业,潘是中国人大的教授,李是中国社科院的教授,真正意义上像西方搞性学研究的人是有的,我们都是兼职的。如果只考虑所做的研究和产生的社会影响,潘绥铭、李银河作为性社会学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,这样的人在中国也很少。

记者:你在性文化史研究上最出名的著作《性张力下的中国人》是怎么出来的?出版顺利吗?

江晓原:这是1994年写的,在动笔前慢慢积累了很多材料,想法,写了半年,1995年出版。这本书实际上是古代中国人性观念的梳理,我自己对性学研究有些心得所以就写了。这书是出版社约稿,出版很顺利,一个字没改就通过了。这书后来获得的声誉据说还挺高,也是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书。

写大众阅读文本是我的乐趣

记者:你提出“跨文本写作”的理念,一边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,一边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。许多学者宁愿自己埋头做研究,反对大众文字。你如何平衡两者?

江晓原:这两种文本不一样。跨文本写作指的是同时进行这两种类型的写作,我一直给研究生开“跨文本写作”这门课,讲学术文本和大众文本的写作,各有怎样的要求和技巧。

有些学术界的人不愿意进行大众文本写作是有原因的,一部分人是没有写大众阅读文本的能力。写的文章烂,报纸不会登,偶尔登了一次,下次也不会登,不会找你约稿写专栏。如果老有人找你写专栏,说明他们认可你的文章。但这个时候也有弊端,比如你写了很多大众文本,会让人产生误解,“某某写的都是大众阅读文本”,很多学者很怕这个印象,这对他的声誉不利。毕竟学者的立身之本是学术文本。时间久了,常写大众文本的人会被学术同行认为这人不好搞学术。我曾经遇到过类似事情,有人拿这和我说话,我不在乎。一是写大众阅读文本是我的乐趣,我喜欢做这个事;第二,我算是学术地位早就确立了,我能在中科院连续破格晋升,1994年当了正教授,都是需要同行评议的。我如果没有发表足够多的学术文本,同行评议怎么通得过?但我一贯标榜自己不务正业,你怎么说我都无所谓。

记者:你有总结过自己的研究方法吗?接下来的学术道路有什么期望?

江晓原:我很少对当代的东西做研究,我好古成癖。研究到底如何能够创新?通常有三个方向,一是研究对象,研究前人没研究过的东西;二是材料上创新,用别人没用过的材料;三是方法上创新,使用前人没用过的方法。我喜欢做别人没做过的东西,完全是个人的天性使然。我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,我不常用新的方法、材料,但我会把甲学科的方法用到乙学科上,把甲学科常见的材料用到乙学科去。对于另外一个学科,它就是新的。我被大家注意的研究,通常是因为我在方法和材料上的跨界,从而体现出创新。

至于期望,我和很多人不一样,我从来没设立过雄心大志,万事随缘。说得好听点是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”——也许这样说有点做作。未来只是把学术生涯继续往下过,我不知道有什么期望。

■ 同题问答

1 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几本?

学术的书有《万历十五年》,西方文艺小说有俄国的《苦难的历程》(三部曲)。挺打动我的。

2 你认为,要做好学问,最重要的是什么?

对某些人是勤奋,对某些人来说是动脑筋、机遇,有的人是天分。对我而言,随缘最重要。

3 你个人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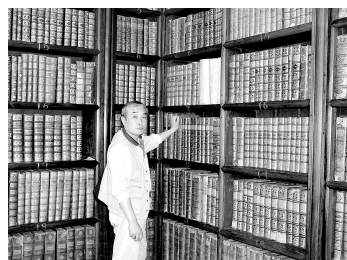
目前为止有两本,《天学真原》、《性张力下的中国人》。

4 学术研究工作要经常到深夜吗?工作习惯是怎样的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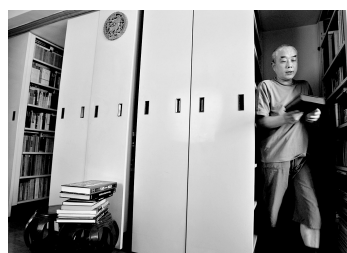
以前经常要工作到一两点,现在大多在一点前睡觉,仍然会有到两点。看电影和工作没有固定时间,不坐班的人没有任何工作与休息的界限。

5 学术研究之外,有什么业余爱好?

三件事:读高雅书籍,看低俗影片,写雅俗共赏的文章。



江晓原在科因布拉大学图书馆。



江晓原在书房。